

【大学生读本】 赛妮亚/主编

房向东 著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读本·赛妮亚 / 主编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

房向东 /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 / 房向东 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7—81115—029—8

I. 关... II. 房... III. ①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②鲁迅 (1881~1936)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②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466 号

书 名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
著 者	房向东
责任编辑	石斌
封面设计	博爱天使
出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 (010021)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4 × 23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期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1115—029—8/I·1
定 价	23.00 元

目录

“实骂”与“虚骂”	
——鲁迅“骂人”现象的文化解析	(1)
鲁迅的“骂人”	(6)
鲁迅的“多疑”	(9)
鲁迅论人的理性态度	(14)
杂文的“不满”与“骂人”	(17)
鲁迅的过错还是时代的不幸?	(21)
鲁迅不是革命家?	(25)
鲁迅不是思想家?	(31)
鲁迅不是文学家?	(38)
鲁迅“私德”问题	(44)
“青年必读书”与“搬出中国去”	(47)
“主将”与“楷模”	(51)
反抗无聊	(80)
“传话人”与“替罪羊”	(83)
“托派”即“汉奸”?	(97)
喜爱鲁迅作品与忠诚“党国”的矛盾	(113)
“教授的教授”如此教授	(120)
闻一多对鲁迅的误解与忏悔	(125)
从中兴到末路?	(134)

流氓的腔调	(138)
李长之的假设	(141)
他被新月和宝岛的浮云遮住了望眼	(144)
“鲁迅不骂蒋介石”？	(157)
鲁迅是汉奸？	(164)
穷、好玩及在弟弟家里闹	(171)
鲁迅的“造像”	(175)
岁月难释旧时嫌隙	(177)
夏志清的矛盾	(183)
语不惊人 不罢休	(186)
信口开河成胡说	(189)
卸载沉重的办法	(191)
附录：	
北京房先生对我的批判	董 桥 (198)
香港董先生对我的“描述”	(200)
纪念馆、“爱国者”及其他	(203)
“伟大”与“狭窄”的性格组合	(211)
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消亡了吗？	(218)
相对于“褊狭”的“宽容”	(221)
嵇康为何而死	(238)
附录：	
关于嵇康的死因及其他	蔡仲德 (242)
也谈嵇康为何而死	张峰屹 (246)
再谈嵇康之死	(250)
被鲁迅踢了一脚？	(258)

杂文与政治	(265)
“同化论”	
——读朱健国《钱穆的失败观》有感	(267)
一种诱惑读者好奇心的猜测	
——关于许羨苏把鲁迅信件交给朱安问题	(270)
文学出口问题	(276)
“佛理”与“原罪”	(278)
“吃饭”问题	(280)
迫于时势	(282)
肩住黑暗闸门的牺牲者	(286)
晴雯是否也爱林妹妹	(289)
文章不宜太像文章	(292)
鲁迅与“闽客”	(295)
鲁迅是怎样当父亲的	(298)
鲁迅的孙子卖爆米花	
——读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有感	(303)
从狩猎到播种	
——《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后记	(306)
我们为什么软弱？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后记	(310)
鲁迅的“家”、议论蟑螂及其他	
——关于《鲁迅：最受诬蔑的人》的一封信	(313)
宏观反思 微观透视	
——介绍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	(318)
杂 感	(323)
鲁迅门下走狗	(325)

“实骂”与“虚骂”

——鲁迅“骂人”现象的文化解析

我以为，关于鲁迅的“骂人”，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可以分为“实骂”和“虚骂”两类。

所谓“实骂”，意即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比如，鲁迅与高长虹冲突中关于“太阳、月亮和夜”的问题，梁实秋的“硬译”问题，刘大杰的标点本的错误问题等等，皆属此类。鲁迅的“实骂”，分析问题本身就是目的。

所谓“虚骂”，意即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在于借题发挥，生发开去。问题的本身不过是起了触发鲁迅灵感、引出话题的作用。鲁迅与引出话题的这类人并无直接冲突，所涉之事，亦无利害关系。这比较典型的应是梅兰芳、马寅初和杨荫榆的例子。鲁迅“骂”梅兰芳，是“骂”梅兰芳所象征的男扮女妆之类不男不女的“太监文化”，是骂“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病态的社会人格。鲁迅骂马寅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文人学者的无聊，与其说鲁迅骂马寅初，不如说鲁迅是在反抗无聊。杨荫榆的情况稍稍复杂一些。鲁迅之“骂”杨荫榆，“实骂”成分是很大的，是主要方面。但是，那篇被有的人认为有人身攻击成分的《寡妇主义》，却是“实骂”中的“虚骂”。文中，鲁迅指出杨荫榆是“寡妇”或“拟寡妇”，实行“寡妇主义”教育，对于大学生，“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这些语言，都是不确定的推测，与杨荫榆所涉无多。其实，杨荫榆虽然独身，但她也和鲁迅一样，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据杨绛介绍，她是奉祖母之命订亲结婚的。她的夫家姓蒋。虽然门当户对，然蒋少爷却是一个“傻爷”，“老嬉着嘴，露出

一颗颗紫红的牙齿，嘴角流着哈拉子”。成亲时，她把“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后来逃回娘家，出外求学。当然，鲁迅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这一身世，倘知道，接受过母亲“礼物”、与朱安有过不幸婚姻的鲁迅，在下笔讨伐“寡妇主义”时，以杨荫榆为话头，也许会有所踌躇？我以为，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这种深切感受，可以说是郁积于长久，得之于偶然。他之所以如此不无刻薄地骂杨荫榆，只不过是找到了灵感的触发点，借题发挥而已。心中有思想，总是要喷发的。若不是杨荫榆，在此后的某日，碰上了牛荫榆、马荫榆，一有机会，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思想，还是要表白的。

鲁迅“骂人”文章的伟大意义，表现在他“实骂”部分包含有“虚骂”的成分，鲁迅是具体的，但他不像一般的平庸的杂文家那样，拘泥于具体。他升华了，超越了，抽象了，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一般”。

我们读鲁迅的论战文章，常常发现，面对对手洋洋洒洒的宏文伟论，鲁迅仅还以匕首般的短文，三言两语便击中要害，致使对手再也无招架、还手的余地。鲁迅的批判，例如在“庄子与文选”论争中将施蛰存称为“洋场恶少”，“两个口号”论争中称周扬为“奴隶总管”，就具体的人与事而言，确有过苛之病；但如果排除个别性与特殊性，跳出具体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典型”，却又是极其深刻的。鲁迅在谈到自己杂文写作的经验时说：“砭锢弊常取类型。”所谓“取类型”，就是如上所列举的抓住典型事件或典型人物。正如鲁迅自己所解释的，“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伪自由书·前记》）这就是说，鲁迅是把“实骂”的对象当作一个标本的，它虚指了“实骂”对象们所代表的所象征的人物。

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实中有虚，由个别而到一般，在于他的思考绝不停留在个别的“这一个”，而是将其放在广阔的时代、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剖析，竭力排除其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快刀斩乱麻迅速切入本质，使其成为具有历史概括性、普遍性的“这一类”的标本。这种从个别现象立即切入本质的整体概括的思维方式，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说，就是“在看到一件事物的一瞬间，就能够从许多偶然性

中，区别出它的基本特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

我们认识鲁迅的“骂人”现象，也应该跳出困囿于“实骂”的误区，跳出个别看到一般。如此，才算是掌握了阅读鲁迅的钥匙。可是，论者每每不察，对鲁迅的“骂人”文章，总以意气论之。对此，鲁迅当年即已感慨系之：“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信）在鲁迅写这封信的前一年多，瞿秋白就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阐述过这种见解：

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卑劣，懦弱，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

鲁迅视瞿秋白为知己，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瞿秋白理解鲁迅，认识他的“骂人”杂感的伟大意义之所在。后来，王得后等人对瞿秋白的鲁迅观有所发挥，他们认为：“鲁迅杂文是个别的，但也是一般的，抽象的。杂文中所涉及的人物、文章、事件，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根有据，都是历史的真实，但又多有一般的意义。因此，人物的生辰八字，文章的最初出处，事件的背景过程，对读懂鲁迅杂文，似乎很要紧，其实又并不那么要紧。”（王得后、钱理群：《〈鲁迅杂文全编〉前记》）是的，具体人物的恩恩怨怨既有重要的一面，也有不重要的一面，既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应该指出的是，随着许多历史人物的相继谢世，这种实的恩怨将逐渐淡化，虚化了。最后，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将

是瞿秋白所认定的作为普通名词的社会典型。

有学者恶狠狠地贬斥鲁迅杂文为“骂人文选”。首先，这是一种因不读鲁迅原著的无知所产生的误解和偏见。在鲁迅一百多万字的杂文作品中，“骂”了人或者涉及“骂人”的，充其量只占百分之一二，怎么可以将其一概斥之为“骂人文选”呢？即使鲁迅作品中最具战斗性的“骂人”部分，它们也决不会由于得罪了某些“正人君子”，因而不间断遭到他们和他们的徒子徒孙的贬斥，而失去所固有的伟大意义。倘若我们真的把鲁迅的“骂人”文章编成一部《鲁迅“骂人”文选》，那其中也自有其“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鲁迅对自己的“骂人”文章就有这样的自信。他说：

这两位（指《中央日报·中央公园》所载《杂感》的作者洲和《文坛与擂台》的作者鸣春——引者按），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

他又说：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

鲁迅的作品中，“大众的灵魂”中反映了“时代的眉目”，“时代的眉目”里也包含着“大众的灵魂”。鲁迅一生的战斗历程，若是把几次主要的“战役”罗列出来，基本上可以看到文学史的一个轮廓。鲁迅

总是把当时的事和当时的人结合在一起。每一个“战役”，鲁迅往往把矛头指向对立面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痛加批判。比如，对复古派的斗争，鲁迅主要矛头指向林琴南、章士钊；对“新月派”的斗争，主要指向梁实秋；对“第三种人”的斗争，则是揪住了杜衡……章士钊、陈西滢等无疑是“大众灵魂”的代表，而与他们的斗争过程，自然又留下了时代的眉目。

概而言之，鲁迅的“骂人”，有骂对的，有稍感过火的，有误会等等。但这都并不重要。它的意义在于“实骂”中包含着“虚骂”的成分；而纯粹的“实骂”部分，也将不断地被历史虚化。鲁迅留给我们的是超越个别、具体的一般和抽象，鲁迅的价值，在于他的“骂人”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典型，大众的靈魂和时代的眉目。

鲁迅的“骂人”

《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关注，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又重印了第二次，国内有十余家报刊发表了评价文章，这对作者来说，自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有不少读者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或者说，是什么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呢？

我所在的单位，是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我不止一回听到名牌和非名牌的大学生，在我面前谈到鲁迅，他们在轻松地刻意地表现自己潇洒的同时——他们不愿与沉重的没有“可读性”的鲁迅为伍——用不屑的口吻说：“鲁迅，无非就是骂人。”说得轻飘飘的。这类无聊的妄语，让我激愤！

读了不少关于鲁迅的书，我很快发现，“鲁迅，无非就是骂人”，不仅是我的一些年轻同事的看法，也是一些名家学者的见解。鲁迅生前，梁实秋就问过，鲁迅到底自己有什么见解呢？他认为鲁迅除了骂人以外，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他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鲁迅思想’是什么……鲁迅思想，其实只是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表示他之‘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而已。而单单的‘不满于现状’却不能构成一种思想。”鲁迅死后，苏雪林骂鲁迅只会“骂人”，骂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睚眦必报，不近人情”……她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

“骂人”似乎成了鲁迅的一条罪状。是的，鲁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得罪”人如此之多，在中国现代文坛和学界，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

可是，我们若是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不能正确认识鲁迅的“骂人”现象。我以为，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几个时期之一。在对传统一元文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的同时，外来文化纷纷涌进国门，逐步形成了文化机制的多元格局。派别林立，论战不休，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的特征之一。彼此骂来骂去，虽有意气用事的时候，但大多是涉及大是大非问题。虽然也有“骂人”的“不雅”，而唯其“不雅”，才更真实，更有生气。较之于文化取向不受制约和挑战的“一边倒”——无论倒向哪一边，不管是雅的还是俗的——都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不是只有鲁迅在那里“骂”，也不都是鲁迅首先开骂。不是的。被称为温文尔雅的梁实秋，不仅骂过鲁迅，甚至也骂过以胡适为代表的“人力车夫”派。带着湘俗湘风进入北京文坛的沈从文，在《沫沫集》中也指名道姓地抨击了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文人。高长虹不仅骂鲁迅，也骂周作人、郁达夫。若说起骂人的“狠”来，又有谁比得过以上所列举的苏雪林呢？只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只读《鲁迅全集》，只看到鲁迅在那里“骂人”，而没看到别人是怎么骂鲁迅的，没有搞清楚是谁首先挑起事端的。

彼此骂来骂去，同是“骂人”，并不是没有区别的。对于时人对鲁迅的攻击，鲁迅要宽厚得多。事实是最为雄辩的，对比是有助于人们搞清问题的。人们攻击鲁迅的，是“学匪”、“学棍”、“赤色作家”、“汉奸”、“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便是“左派”的同志，也说鲁迅“右倾”、“危害联合战线”、“助长着恶劣的倾向”……都是含着杀机，可以遭到通缉、撤职、逮捕、监禁乃至杀头的诬陷和谣言。而鲁迅的反击，给论敌定的大多止于“正人君子”、“绅士”、“叭儿狗”、“资本家的走狗”、“鹰犬”、“洋场恶少”、“才子+流氓”……无一有生命的危险，就是直斥为“帮凶”，也与他们的主子划出分明的界限。

不少人由所谓鲁迅的爱“骂人”，继而得出结论，认为鲁迅心胸狭窄，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傅东华伤害过鲁迅，鲁迅最后还是宽容了他，应他之约，仍旧为他办的刊物供稿；周木斋攻击过鲁迅，鲁迅也宽容了他……鲁迅把丁玲误解为沈从文，也对杨树

达的“袭来”事件过于多疑，但他一旦知道了事实真相，立即忏悔。对比之下，很多被鲁迅批评过的人，有的甚至是事实证明鲁迅批评得对的，过了半个多世纪，却仍然耿耿于怀，比如夏衍，他的打冯雪峰，实际上是打鲁迅；比如施蛰存，目下他将近百岁，尚不能释然，说当年是鲁迅“踢了他一脚”；又比如梅兰芳，建国后，梅兰芳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凡鲁迅纪念会，他很少出席，勉强来了，从不发言，而且往往是迟到和早退……相比之下，究竟是别的一些文化名人还是鲁迅更小气、更褊狭？广大的读者应是自有公论。

鲁迅是宽厚的。曾经挨过鲁迅“骂”的傅东华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惟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

鲁迅的“多疑”

鲁迅“骂”过这么多人，他为什么老爱“骂人”呢？“正人君子”们、同一阵营的战友们于是说他“多疑”。“多疑”这个词儿与“尖刻”、“刻毒”等一起，是鲁迅同时代以及以后的人们评价他的常用语汇。另一方面，忠诚于鲁迅的人们，也考虑到“多疑”是贬损鲁迅的，所以，为尊者讳，对鲁迅确有“多疑”之处的实例，多持避而不谈的态度。

我以为，我们首先应该正视鲁迅的“多疑”。鲁迅就曾承认自己有“多疑”的时候，鲁迅的“骂人”生涯中，也不难举出“多疑”的实例。在以直率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和心情而著称的《两地书》中，他谈到“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两地书·八》）“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两地书·一〇》）这算不算鲁迅承认了自己的“多疑”呢？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中，鲁迅是明确地承认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鲁迅还曾说，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这种“毒气和鬼气”是一种泛论，当然也包含了“多疑”。若说鲁迅“多疑”实例，又可以举“杨树达”袭来事件，误认丁玲求助信为沈从文捉弄事等。从这些实例看，鲁迅确实是“多疑”了。

然而，在讲鲁迅“多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鲁迅并不多疑，相反，有时倒是过于天真了。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讲了那个著名的鲁迅“儿子”的故事，那是叫人哭笑不得的。许广平感慨道：“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呆子吗？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许广平忆鲁迅》，第234—235页）还有那个声称持有烈士遗稿《孩儿塔》的

史济行，也轻而易举地骗取了鲁迅的信任，还让他老夫子动了感情，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可是，史济行是这样一个重友情的人吗？他只是一个骗子。钱理群认为，从鲁迅给曹靖华、章廷谦、萧军、萧红、胡风等人的书信中，会强烈地感到鲁迅对人的诚挚、直率、宽厚，无微不至甚至天真。“应该说，这都比较接近鲁迅的真性情。”（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67页）鲁迅摘译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有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又说：“人们多注意到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这一面，而往往忽视了也许是更为本质的一面，即‘常存单纯的心’。一切站在历史的高峰，看透现实、因而超越现实的伟大人物，必定有‘返朴归真’的一面。萧红曾经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我常想，能够这样放怀大笑的人，一定有一颗纯真的心。”

鲁迅既是“多疑”的，又是不设防的，单纯的。

鲁迅有种种矛盾，他有时责怪自己太易于猜疑，有时又认为“多疑”并非坏事。他说：“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对世事人物持怀疑的眼光，于不疑处有疑，疑而能断，这不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了。鲁迅这里谈“多疑”时用了“怀疑”这样的字眼。多疑，也就是多了一点怀疑。

说鲁迅“多疑”，言而有据；说鲁迅不“多疑”乃至单纯，一样言而有据。事实是，鲁迅是心地单纯的。然而，他生活在一个可怀疑的国度，这个国度里有许多互相猜疑的人们，这个国度里有许多可猜疑的事物。于是，任你怎样单纯，也不得不变得“多疑”起来。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吧。钱理群等许多有识之士都把眼光注视到了这一点。鲁迅的“多疑”，乃是上世纪空前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产物。历史正经历着“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

墓”，新的婴儿诞生前漫长的阵痛，这是一个充满了污秽与血的时代，在生与死的最后搏斗中，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全部剥落，露出本来面目的疯狂与卑劣：古今中外——人类历史、现实中一切阴谋诡计、鬼蜮伎俩竟然集中于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鲁迅经常痛苦地谴责自己：“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我还欠刻毒……”（《三闲集·通信》）鲁迅更忧虑着“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容易“上当”，“碰顶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1934年12月10日致萧军、萧红信）现实就是如此严峻：在你死我活的拼杀中，人们的天真，思维方式的简单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鲁迅自己就多次“亲历”了这样的流血，而且多是最为宝贵的青年战士的血。社会、时代的大环境，让鲁迅持怀疑的眼光看问题。鲁迅不能不以“多疑”的冷眼看当时的社会。

就具体而言，许多人的作为也证明着实际生活中有着可怀疑的人和事。其实，从某一方面讲，鲁迅疑得还不够，他对人的推测，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有些人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比鲁迅对他们的推测还要坏得多。上文提到的史济行就是一例。当后来鲁迅知道史济行所谓藏有《孩儿塔》文稿完全是假的，他这样说完全是为了骗取鲁迅的手稿后，鲁迅不禁感慨系之，说：“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

正是这种教训，使鲁迅常用多一点怀疑的眼光去看社会、看人。“多疑”，并非鲁迅的罪过，事实常常证明他“疑”得对。“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的这个怀疑并没有错，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并不是真正站在民族立场的爱国者，而恰恰是一批“洋大人的宠儿”，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谄媚之态，并竭力鼓